

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

——基于华东四省四所县中高三学生的调查

汪卫平

[摘要] 大学准备度是预测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并在大学有效适应的重要指标,但在国内却尚无系统研究。基于父母参与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的框架,文章利用华东地区四所县中高三学生的调查数据,探索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父母的学业参与程度和质量只与以独立书桌、父母教育程度衡量的家庭文化资本相关。多元线性回归证实,父母学业参与能有效提升子女的大学准备度,但存在异质性。学习奖励对高文化资本家庭更有用,学业惩罚对低文化资本家庭更有用。父母学业鼓励以及和子女共同讨论学校发生事情对大学准备度的提升作用相对更稳健。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与作业相关的父母参与均不能通过提升子女的教育期望进而提升大学准备度。在国内加快推动家庭教育立法的背景下,对父母的学业参与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注重参与策略和技巧,关注子女非认知能力。对于弱势群体家庭而言,学校更应该弥补他们在大学准备度上的劣势。

[关键词] 父母学业参与; 大学准备度; 高三学生; 教育期望

一、引言

2019年电视剧《小欢喜》热播的背后反映的是全社会对父母如何参与子女

[收稿日期] 2021-02-21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倾斜政策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影响因素研究”(71673054)与复旦大学团委2018年暑期知行计划(2018SXJ050)的系列成果。

[作者简介] 汪卫平,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wangweiping0733@163.com。

[致谢]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牛新春研究员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郑雅君博士对问卷的编制,复旦大学高教所第一届博士生学术沙龙的学友以及外审专家对本文初稿有诸多建设意见,作者一并感谢,但文责自负。

高考备考的极大关注。然而父母介入真的有助于子女的大学准备吗?从目前来看,国内关于如何助力学生从高中到大学顺利过渡的讨论似乎还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媒体不断披露出的学生在高中到大学转换过程“准备不足”问题。首先,许多高中阶段就应培养但却被忽视的素质在大学阶段开始由学生自己买单。如大学生“不会写、逻辑差”的新闻应接不暇,《光明日报》还曾专门进行跟踪报道(邓晖,2018)。实际上该问题的根源在充当指挥棒的高考作文中就似乎已经显现。阅卷专家反映近年来高考作文的套路化和“假大空”现象(仲玉维和杨国营,2013)。其次,从大学新生在校适应情况来看,高中阶段对学生学习习惯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黄兆信和李远煦,2010)。再者,从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来看,大学生学术写作、批判性思维等高阶思维和能力的存在严重不足。最后,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的大学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失误问题屡见报端。名牌大学独立学院分数线也被哄抬得奇高。随着国内新高考改革复杂的制度设计^①,给高考报名选择和院校多元化带来复杂性。例如,高等学校设置的变化、院校性质和层次多样化,进一步使学生的选择变得更有挑战性,尤其是使弱势群体更易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家长对子女大学备考却又十分重视,但如何将这些重视转化为切实助力子女备考的学业参与,还缺乏有效参照。尤其是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背景下,高三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业参与无疑都是巨大的。那么家长参与能否帮助孩子提升相应的大学准备度呢?家长该如何有效介入呢?现有文献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就国内而言,对于高考备考的相关研究还缺少一个理论化的系统建构。因此大学准备度对当前高中—大学衔接的研究是一个既陌生又很重要的概念。

在县中衰落(杨三喜,2019)以及高等教育的竞争由“入口”向“质量”转变的背景下,为弥合上述矛盾,洞察学生教育表现差异背后的家庭背景因素,以及响应政府和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视的号召^②,本研究利用对华东地区四所县中高三学生的调查数据,首次系统地建构大学准备度的概念,进而探索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为家庭、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决策与改革探索提供实证依据。

^① 例如山东省新高考实施后的志愿填报,存在多种学科组合策略,学生总共可以填报96个专业。

^② 家庭教育立法已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相关背景参见:杨程,2021:《家庭教育立法赋能教育改革发展》,《中国教育报》,1月26日;闵萧,2021:《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立法只是第一步》,《光明日报》,1月21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大学准备度及其影响因素

大学准备度是当高中生想要顺利进入大学,并在大学中的学习和生活都实现很好的适应,所进行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心理和社交能力、大学信息和招生录取政策知晓的准备程度。严格来说,它是来自美国教育实践和研究的舶来品,是预测学生进入大学以及实现中学到大学过渡的重要指标(Mokher and Leeds, 2019)。美国联邦教育部在2000年就将其列为七大国家教育政策重点之一(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他们既有国家层面对高中生和学校大学准备度的评价系统,如美国大学理事会的“大学准备和成功系统”(College Board Readiness and Success System),美国院校研究系会下属的“大学与职业准备度中心”(The College & Career Readiness & Success Center),以及ACT每年发布的高中生“大学与职业准备指标报告”(ACT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Standards),也有州层面上自行发布的大学准备度系统,主要融合在各州“核心共同标准”框架之内(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此外,高校也发布大学准备系统以及调查活动,如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College & Career Readiness Survey)等。

相较而言,俄勒冈大学 David Conley 教授团队开发的大学准备度是一个较经典的框架(Conley, 2007)。该框架20余年来不断修正和完善(Conley, 2008),最终推出了一套成熟的测评系统(现由 EdImagine 公司运营),在学界也引起了较大关注(Conley and French, 2014)。最重要的是因为该测评系统更具有操作性,所以被许多学校和政府机构采纳(Baber et al., 2010),其将大学准备度划分为关键认知能力(Key Cognitive Strategies)、关键内容能力(Key Content Knowledge)、学业行为(Academic Behaviors)、情境化能力与意识(Contextual skills & awareness)四个维度^①(参见表1)。

^① 关于该指标更详细的内容参考 David T. Conley, 2012, *College and Career Ready: Helping All Students Succeed Beyond High School*, Hoboken: Jossey-Bass.

表1 David Conley 教授团队开发的大学准备度框架

维度	操作化指标
关键认知能力	大学学习需要的一些由认知行为构成的能力与技能，如问题形成、研究、解释、交流、准确度
关键内容知识	一些基础性知识；了解学科专业。如数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学业行为	学校所必须的一些特点。这些学业行为要求学生必须为其学习负责，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监督，自控力
情境化能力与意识	进入大学必须要具备的信息与技能：了解大学入学过程；学校文化、学费与资助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以及学习文化传统与美国有差异，但该指标仍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因为国内中学—大学衔接的问题一直难以取得有效突破，大学准备度的引入能够作为一个支撑点；另一方面，大学准备度能帮助识别弱势群体学生以及对高中教育质量评价指标改善上有所作为，进而弥补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劣势。事实上，国内也有研究关注了大学准备的零散框架，如大学信息收集(鲍威等，2019；魏建国等，2011)，高中课堂学习和思维训练(鲍威和李珊，2016)，高中学习经历(赵琳等，2014)，以及学生在高考后的暑假生活(马莉萍和朱红，2014)等。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关注中学—大学衔接过程中整体的大学准备情况。仅有的涉及大学准备度的两篇文献，其中一篇介绍了美国的做法(王晓东和范武邱，2017)，另一篇则关注父母的大学准备参与度(华桦，2019)，而这似乎与现有大学准备度框架有很大出入。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学者相信父母参与在子女大学准备中的作用，并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大学准备中(Leonard，2013)。然而，当前对大学准备度的研究，只关注学校和同伴效应的影响，忽略了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参与的影响。因此，当前对父母在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仍缺乏实证研究。

(二) 父母学业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父母参与理论(Parent engagement theories)传统上来自布迪厄、拉鲁和科尔曼等人关注的文化和社会资本概念。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父母参与，其重要性很早就引起关注。虽然对父母参与的界定莫衷一是(周文叶，2015)，但总体上可分为两派。一部分学者根据活动发生范围将其分为家庭和学校参与；另一部分学者根据活动性质将其划分为监督、管控、共同参与等维度。总体来说后一种方式更主流。例如，李波(2018)将父母参与操作为：亲子阅读、亲子活动、亲子交流、作业督导和家校互动。Perna 等人(时间)操作为：

关于学生的课程选择、学校活动、家庭作业、成绩、参加高中会考或 ACT 的计划以及大学申请的讨论。Häfner 等人操作为：当子女考差时与其交流、帮助子女在数学作业中纠正错题、主动帮助孩子(如果他/她理解不了数学课的内容)、控制孩子的数学作业、帮助孩子提前做好考前复习(李波, 2018; Häfner et al., 2018; Perna and Titus, 2016)。

传统文献基本证实父母参与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李晓晗和郑磊, 2017)、家庭经济水平(吴重涵等, 2017)、子女学业表现等因素影响。从投入精力和稀缺性考虑, 罗良等(2014)发现高质量父母参与具备“结构化、自主性支持、关注过程、投入积极情感、父母共同卷入以及让孩子感知并且愿意接受”等特征。因此, 本研究认为“作业帮助、作业知晓、共同讨论”等维度的参与质量相对较高, 而日常的“奖励、鼓励、惩罚”, 甚至是简单“作业提醒”的参与质量相对较低。因此, 笔者提出:

假设 1-1: 家庭背景对父母的学业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即优势家庭背景的父母, 以及子女学业表现优秀的家庭, 他们在家庭中对子女的学业参与程度会更好。

假设 1-2: 优势家庭的父母学业参与质量可能会更高, 会集中于学业辅导; 而弱势群体的父母参与可能集中于低质量的活动。

然而,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教育期望等方面的影响。李波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 46 所学校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 亲子阅读、亲子活动和亲子交流能提高子女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李波, 2018)。部分文献还发现父母参与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Thomas et al., 2019)。李佳丽等人利用 CEPS 数据证实, 亲子陪伴、亲子交流和家校沟通、课外补习都对学生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这种作用显著大于课外补习(李佳丽和薛海平, 2019)。吴帆等利用 CEPS 追访数据也发现父母参与显著降低学生不良学业行为, 而情感参与的影响最重要(吴帆和张林琥, 2018)。梁文艳等利用 CEPS 基线数据发现, 与孩子交流学校发生的事情、陪孩子参观博物馆、积极参加家长会、主动联系老师这四项行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通过儿童自我教育期望来实现(梁文艳等, 2018)。最后部分文献发现父母教育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 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更为明显(王毅杰和黄是知, 2019)。

需要注意的是, 父母参与对子女的影响研究结论并不稳健, 尤其在中国的结论很不一致。部分文献发现父母参与并不能促进子女的教育表现, 甚至有负面影响。郭筱琳等人对山东聊城的调研发现, 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郭筱琳等, 2017)。利用加拿大 2002 年国家调查数据, 研究

者发现父母监控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Areepattamannil, 2010)。高燕利用郑州市中小学生的调查也证实,父母认知参与对子女语文、数学成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燕,2016)。北师大大的调查也证实父母每周指导功课的频率越高,对子女语文成绩的阻碍程度最大,而父母每周检查作业的频率越高对于学生语、数、英都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至于其原因,除了可能被忽视的调查方式以及样本自选择问题,部分研究者指出家长的过度干涉可能挤占子女的学习时间(高燕,2016),或是该影响受到学生内在学习效能感调节等(郭筱琳等,2017)。

(三)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当前父母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子女的学业结果而不是准备程度,少部分文献也关注父母学业参与对低年龄段(学前阶段)子女准备度的影响(Sheridan et al., 2010),因此就更少有文献对大学准备度进行研究。极个别年轻学者关注到了父母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的影响。但这仅存的文献几乎都是质性研究,缺乏大样本调查。

Pearson (2018) 将社会情绪学习能力视为重要的大学准备能力,在对新泽西两所高中生父母的质性访谈中发现,积极的父母参与能够促进子女的社会情绪能力,而其中可能是通过父母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观念,学生自我主动性学习等起作用。Lauren (2013) 对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访谈中也证实,父母的参与能够更好帮助他们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可以让他们在大学期间敢于冒险、认识新朋友、适应新环境。Holcomb—Mccoy (2010)的质性研究借由高中教师的视角进一步证实对弱势群体而言,鼓励父母参与子女的大学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父母的学业参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此,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又往往具有异质性(安桂清和杨洋,2018;高燕,2016;Spera, 2005)。因此,笔者提出:

假设 2-1: 父母学业参与程度与子女的大学准备度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父母学业参与能显著提升高三学生的大学准备度。

假设 2-2: 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文化资本的家庭由于父母参与质量较低,因而并不能像高文化资本家庭一样发挥相同效果。

最后,动机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将外在刺激内化为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更能推动行为高度自主和意志控制。自我教育期望是激发个体为实现目标而做准备的重要动力(Ryan and

Deci, 2000)。Leonard (2013) 对一所郊区高中和社区学院进行3年追踪调查, 进一步证实父母参与在对学业成绩提升、情感引导、财政支持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George (2018) 等人对美国9年级学生的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父母参与同样也融合在学校层面的学业活动中, 在个体和学校层面, 父母的参与会营造“要去上大学”的文化氛围, 而这正是子女步入大学的重要里程碑。基于上述论述, 笔者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结果的影响, 可能是通过学生的自我期望值实现。

因此, 提出本文最后一个假设。假设3: 父母参与主要通过教育期望效应, 进而提升学生的大学准备度。

三、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借鉴钟宇平等(2005)的方法, 本文首先确定调查省份, 其次确定地级市及所辖县, 再者确定公办县中, 最后对在校的所有高三学生进行全样本调查。(1)在省份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 传统华东地区的行政区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选择距离相对较接近、文化相近, 且崇尚读书、学习氛围较浓的高校。第二, 综合考虑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考报名录取率等因素。第三, 高考全国卷和自主命题试卷的分布情况, 尽量选择全国卷覆盖的省份。第四, 借鉴已有关于高中学生实地调查的选址, 我们发现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是最热门的省份。(2)在选择地级市和下辖县时, 我们主要考虑人均GDP的排名以及调查学校的可行性方面。本文选择了各省人均GDP排名在末位的四个设区的地级市以及下辖的县。(3)我们只调查县域范围内的公办县中, 尽量保证其办学水平、学生高考录取率(不考虑重本线)也相对较为接近。

研究者利用复旦大学团委暑期知行计划与县中合作的方式, 对安徽、江西、江苏、山东四个地级市下属的县中高三学生进行调查。由于问卷发放、填写、回收和录入都得到了有效监督, 所以我们一定程度保证了较高的问卷回收率和填写质量。本研究共收集到3889份问卷, 剔除无效样本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 最终共获得3826份有效问卷。由于部分主要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且部分变量缺失率高于15%, 所以我们采用缺失值插补的方法, 避免列删法而遗失有用信息。具体来看, 我们采用单一插补的方式, 对连续变量采用均值进行插补, 而对分类变量采用众数进行插补。

(二)主要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大学准备度。借鉴 Conley (2007) 的大学准备度框架, 考虑到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招生考试的特点以及可操作性, 采纳了关键认知能力、学业行为、情境化能力三个维度。(1) 关键认知能力主要测量学生是否具备大学层次需要的语言、思维和逻辑能力。我们采用高考中最重要的语文和数学两门学科的学生主观评价作为代替性测试对象(王菊韵, 1994; 周晨和周凌轲, 2019)。其中, 数学^①和语文科目^②各有五道题。(2) 学业行为和努力测量的是学生为上大学而做的学习和心理上的准备程度, 共四道题^③。(3) 情境化能力指的是学生为进入大学而对录取过程、招生政策的了解和知晓程度^④。大学准备度由上述三维度加总而得。

上述所有单项指标的测量全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 在实际分析时转化为 10 进制的 0—100 取值。在此基础上, 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法从各指标维度下提取出一个因子, 并将其进行离差标准化(又名 0—1 标准化)转换, 将取值固定为 0—1 之间, 接着又将其取值转化为 0—100 之间。得分越高, 代表学生的大学准备度越好。由于我们对大学准备度三个维度的测量采用间接方式, 因此我们对大学准备度的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关键认知能力维度, 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13, 分题项 Cronbach's α 系数均高于 0.8。情境化能力维度, 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782, 各题项 Cronbach's α 系数均高于 0.6。学业行为维度, 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043, 各题项 Cronbach's α 系数也均高于 0.5。因此除了学业行为维度, 问卷总体呈现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核心解释变量为父母学业参与。借鉴已有研究(李波, 2018; Häfner et al., 2018; Perna and Titus, 2016), 本文将父母学业参与界定为重视、监督、

① 这五道题分别是: 能清楚知道题目涉及的知识点; 能计划好解决问题思路; 对最终得到的答案有个回头思考过程; 会质疑题目是否出错导致无法得到答案; 会试着探索更好的解题方法; 对自己的解题正确率有预判。

② 这五道题分别是: 会注意写作过程中开头与结尾衔接; 能将论点与论据联结起来; 会注意论点提出是否符合逻辑; 能通过草图改善观点和推理过程; 在写的过程能联想起以前读过的内容、材料; 会对文字、语法进行检查。

③ 这四道题分别是: 我计划在高考前接受备考辅导培训; 我会针对性提升自己的薄弱科目; 我已经或计划去参观心仪的校园; 学业努力程度。

④ 这几道题分别是: 我知道我所心仪大学的录取分数; 我知道可以向谁请教填报大学志愿; 我知道大学填报志愿的过程; 我和在校大学生谈论过大学校园学习与生活; 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等特殊招生政策; 专科升本科的政策(如自考); 贫困地区定向招生政策; 大学奖、助学金政策。

帮助和共同从事等四个维度,并将其操作化为:(1)成绩进步时给予特别奖励(学习奖励)^①;(2)成绩退步时限制我的某些活动(学习惩罚);(3)鼓励我努力学习(学业鼓励);(4)提醒我做作业(作业提醒);(5)做作业遇到困难他们会知道(作业知晓);(6)对我的作业给予帮助(作业帮助);(7)和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共同讨论)。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点计分法,在分析时全部进行10进制转化,转换为0—100取值。得分越高,代表父母的学业参与更多。对父母学业参与的7个题项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发现,整体Cronbach's α 系数为0.7521,各题项的Cronbach's α 系数也均高于0.68,呈现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2报告的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情况。除了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外,本研究还涉及一些控制变量,如户籍、性别、复读、民族、独立书桌、父母最高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学业表现、是否家庭第一代大学生^②、独生子女等。

表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N=3826)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赋值方式
被解释变量				
大学准备度	198.70	34.06	0—300	
学业努力和行为	67.71	13.62	0—100	
关键认知能力	67.21	15.00	0—100	
情境化能力	63.89	17.55	0—100	
解释变量				
成绩进步时给予特别奖励	69.72	25.99	0—100	
成绩退步时限制我的某些活动	58.49	28.99	0—100	
鼓励我努力学习	85.45	19.96	0—100	
提醒我做作业	75.39	24.57	0—100	
做作业遇到困难他们会知道	45.331	26.797	0—100	
对我的作业给予帮助	43.238	27.881	0—100	
和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65.314	28.216	0—100	
自身教育期望(年限)	18.63	3.247	12—24	
控制变量				
农村	0.658	0.564	0—1	0=城市, 1=农村

① 括号中代表的是出于简便性考虑,在下文中将采用简短表达进行替代。其余六个维度均同理。

② 在问卷中询问学生其“家中是否有其他大学生”。

续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赋值方式
男性	0.483	0.499	0—1	0=女性, 1=男性
家庭经济水平	1.889	0.441	1—3	1=困难, 2=中等, 3=富裕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10.438	2.991	0—19	
复读	0.07	0.255	0—1	0=否, 1=是
独生子女	0.369	0.483	0—1	0=否, 1=是
家庭初代大学生	0.097	0.296	0—1	0=否, 1=是
独立书桌	0.803	0.397	0—1	0=无; 1=有
班级学业表现	2.124	0.804	1—3	1=较差, 2=中等, 3=优秀

(三) 计量方法

首先, 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线性 OLS 回归的方法, 探索影响父母参与的因素以及父母参与对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在学校层面, 本文将通过控制学校固定效应和报告稳健标准误来剔除学校层面难以观测的异质性问题。其次, 为了解父母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影响的异质性, 我们采用了分组回归的方法。为进一步比较系数的组间差异, 采用了基于似不相关模型的 Suest 检验方法。最后, 为了探索父母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机制, 我们将分析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这一中介机制是否起作用。尽管中介效应检验存在多种方法, 但本研究采用逐步检验技术。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 第一步检验 X(父母学业参与)对 Y(大学准备度)的总效应, 第二步检验系数乘积效应(“X 对 M(子女教育期望)的效应”×“M 对 Y 的效应”), 第三步检验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 即总效应—系数乘积效应是否等于 0。由于大学准备度属于显变量, 且信度检验也均未达到 0.9 以上的标准(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逐步检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哪些因素会影响父母的学业参与

根据父母学业参与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我们将多元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Academic_engagement_i = \beta_0 + \beta_1(X) + SCHOOL + \epsilon \quad (1)$$

其中, $Academic_engagement_i$ 代表的是父母学业参与的七个维度。X 代

表的是包括户籍、复读经历、民族、独生子女、初代大学生、独立书桌、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学业表现等解释变量的向量。*SCHOOL* 代表学校固定效应。表3呈现的是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父母学业参与水平在城乡、复读、民族、初代大学生、独生子女等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唯独在“与子女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城市学生父母的参与程度要显著高于农村。这也与直觉一致,农村学生的父母更有可能因为精力和文化水平的缘故,无法投入到高质量的学业讨论中。

表3 父母学业参与的影响因素

	学习奖励	学习惩罚	学业鼓励	作业提醒	作业知晓	作业帮助	共同讨论
农村	-0.306 (1.307)	-3.675 (1.562)	-0.733 (1.254)	3.198 (2.214)	-0.450 (1.543)	1.347 (1.690)	-1.263 (0.921)
复读	1.009 (0.859)	3.664 (1.953)	-0.718 (0.728)	-0.100 (1.333)	3.959 (2.201)	2.308 (2.514)	-0.236 (0.790)
男性	-2.424* (0.908)	3.544** (1.068)	-3.122** (0.732)	-0.490 (0.609)	2.005 (1.344)	3.295 (1.671)	-1.739 (1.517)
汉族	2.559 (4.091)	-0.680 (3.609)	-0.512 (1.900)	-3.327 (3.059)	-8.119* (3.438)	-3.136 (2.181)	-4.095 (3.061)
独生子女	-1.011 (0.490)	1.596 (0.973)	-0.502 (0.687)	-1.405 (1.211)	-2.720 (1.959)	-3.041 (2.208)	-0.344 (1.905)
初代大学生	-6.294** (1.835)	-1.294 (1.562)	-1.087 (1.348)	-3.124 (1.566)	-5.058** (1.520)	-4.490 (2.358)	-5.622* (2.253)
独立书桌	6.483*** (0.822)	6.307*** (0.701)	3.243* (1.117)	3.390** (0.615)	5.486** (1.048)	5.420** (1.227)	6.662*** (0.715)
父母教育程度	0.139 (0.141)	0.331 (0.261)	-0.0479 (0.155)	0.0304 (0.175)	0.602** (0.152)	0.789** (0.151)	0.509* (0.211)
<u>家庭经济水平(参照组:困难)</u>							
中等	2.842 (1.744)	-0.766 (0.743)	1.869 (1.365)	1.840 (0.980)	1.916 (1.408)	1.307* (0.499)	0.425 (0.554)
富裕	6.459** (1.433)	0.153 (1.213)	3.291 (3.314)	3.939 (2.705)	1.715 (1.898)	1.352 (2.113)	1.474 (2.853)
<u>班级学业表现(参照组:较差)</u>							
中等	3.598* (1.388)	2.415** (0.554)	3.690** (0.696)	2.332* (0.931)	4.482** (0.978)	2.852** (0.761)	4.606** (1.025)

续表

	学习奖励	学习惩罚	学业鼓励	作业提醒	作业知晓	作业帮助	共同讨论
优秀	3.836 (1.638)	0.391 (2.046)	5.118** (1.130)	1.176 (0.758)	1.972 (1.457)	0.167 (0.447)	5.877** (1.519)
常数项	61.01*** (7.264)	51.23*** (4.204)	81.79*** (5.615)	76.10*** (8.020)	45.45*** (5.899)	37.61*** (5.112)	65.82*** (6.920)
样本量	3826	3826	3826	3826	3826	3826	3826
R ²	0.039	0.029	0.029	0.015	0.037	0.032	0.058
学校固定效应	YES						

注：(1)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次的稳健标准误；(2)***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但父母参与在性别维度存有部分差异。“成绩进步给予特殊奖励”和“鼓励我努力学习”，父母对男性的参与水平要显著低于女生。而在“成绩退步时给予限制活动”，男性比女性获得更多关注。这也与中国社会中女性学习习惯以及角色文化一致。女生成熟更早，更倾向于遵守学校和家庭规则，而男生更可能偏离规则，因而会受到更多父母介入。以独立书桌衡量的家庭文化资本可以明显看出，在父母参与的各个维度上，文化资本高的家庭，父母学业参与水平也越高。同时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学业参与程度也越高，但是从统计显著性上来看，这一趋势只出现在“了解子女作业困难”“作业帮助”“讨论学校活动”等三个维度。在家庭经济水平方面，除了“作业帮助”维度，其他维度都不存在父母学业参与水平在经济水平各维度有显著差异的现象。从班级学业表现来看，在“学习鼓励”和“共同谈论学校发生的事情”维度上，子女的学业成绩越好，父母参与水平就越高。而在其他维度，子女学业成绩处于中等水平的，其父母的参与水平为最高。

总体来看，假设 1-1 仅得到部分支持，而假设 1-2 则得到了验证。家庭背景优势的父母在一些高质量参与上优于弱势家庭。父母学业参与程度与家庭背景并无显著的线性关系，只是与父母教育背景及家庭文化资本有关系。这一研究与国内相关父母学业参与的结论不太一致。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本文调查对象为即将高考的学生，因此无论何种家庭都会对这种关系人生命运的事件极为重视。尤其是对于家庭弱势父母，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也许更为强烈，因而对于孩子学业参与上会更为积极主动。这与当前县中周边的家长陪读现象是一致的。很明显的差距体现在高质量父母参与上，家庭背景越优势的父母，参与程度也更高。

(二) 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估计父母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Collegereadiness_i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beta_7 X_7 + CONTROL * \gamma + SCHOOL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Collegereadiness_i$ 代表大学准备度的综合指标及下属三个子维度, $X_1 - X_7$ 分别代表父母学业参与的七个维度, $CONTROL$ 代表的是诸如户籍、性别等控制变量。 $SCHOOL$ 代表学校固定效应。表4呈现的是分析结果。从大学准备度综合指标来看, 父母学业参与的所有维度均能有效预测子女的大学准备度。从大学准备度的三个维度具体来看, 在提升子女的情境化能力上, “学业退步的限制活动”“学业鼓励”“了解子女的作业情况”“给予作业帮助”“共同讨论校园生活”等因素都能起着正向积极作用。在提升子女的关键认知能力上, 父母参与的各个维度都对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学业努力和行为上, 除了学习奖励, 父母参与的其他维度都对其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 我们认为在激励学生学业努力上, 传统的奖励行为并不能显著提升子女的学业努力, 相反的是, 存在学业惩罚机制, 他们的学业努力行为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因此, 假设2-1得到有效支持。

表4 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①

	情境化能力	关键认知能力	学业努力和行为	大学准备度
学习奖励	0.047 (0.023)	0.040*** (0.007)	0.029 (0.015)	0.117* (0.038)
学业惩罚	0.015* (0.006)	0.028** (0.008)	0.027** (0.005)	0.062** (0.017)
学业鼓励	0.054** (0.013)	0.053* (0.021)	0.079** (0.021)	0.159** (0.045)
作业提醒	0.012 (0.016)	0.010* (0.003)	0.020* (0.008)	0.023* (0.008)
作业知晓	0.044*** (0.004)	0.046** (0.013)	0.046* (0.017)	0.127** (0.025)

^① 为验证结论稳健性以及解决样本自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 我们以大学准备度作为因变量, 将父母学业参与的七个变量分别操作为虚拟变量(李波, 2018), 进行倾向值匹配技术分析。结果同样证实父母学业参与能够提升子女的大学准备度。其中, 父母与子女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的效应值最大, 而学习惩罚的效应值最小。出于篇幅考虑, 文章中省略了该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续表

	情境化能力	关键认知能力	学业努力和行为	大学准备度
作业帮助	0.089*** (0.003)	0.093*** (0.010)	0.044* (0.016)	0.193*** (0.024)
共同讨论	0.016 (0.009)	0.043** (0.013)	0.020* (0.009)	0.054* (0.018)
常数项	42.690*** (5.820)	42.081*** (6.654)	45.842*** (4.359)	141.364*** (17.268)
样本量	3826	3826	3826	3826
R ²	0.124	0.214	0.194	0.2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学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1)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次的稳健标准误；(2)*** $p < 0.01$ ，** $p < 0.05$ ，* $p < 0.1$ ；(3)控制变量：户籍、性别、复读、民族、独立书桌、父母最高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学业表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独生子女等。(4)下表同。

(三) 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影响的异质性

鉴于独立书桌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衡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刘爱玉和徐春蕾, 2019), 本文以家庭是否有独立书桌将学生分为高和低文化资本家庭, 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父母参与学业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回归模型与方程(1)基本一致, 在有无独立书桌的两组学生中分别进行回归。表5证实从大学准备度的综合指标来看, 学习奖励、学业鼓励、作业知晓、作业帮助、共同讨论等维度均对高文化资本家庭更有用。该结果与Li和Hamlin(2019)的发现“父母参与的效果对更有可能参与子女学习中的家庭更明显”也一致。而学习惩罚则对低文化资本的家庭更为有效。此外, 父母提醒子女作业在两类群体上都不能预测子女的大学准备度。

从大学准备度的具体指标来看, 首先在情境化能力上, 学习鼓励、作业知晓、作业帮助对高文化资本家庭更有效; 学业惩罚对低文化资本家庭更有效。其他维度均不存在群体异质性。其次, 在关键认知能力上, 只有父母与子女共同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对高文化资本家庭更有用, 其他维度上均不存在群体异质性。最后, 在学业行为和努力上, 学习奖励、学业鼓励、作业提醒、作业帮助对高文化资本家庭更有用, 在其他维度上不存在群体异质性。因此, 假设2-2也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 学习奖励对高文化资本家庭更有用, 而学业惩罚对低文化资本家庭更有效。父母的作业提醒对子女的大学准备度的预测较差。而关于前者的结论, 与既有关于父母参与但不涉及大学准备度的文献也吻合。这可能

因为“底层文化资本”的作用。例如, Stephany (2017) 对在美非法移民的拉丁裔父母参与子女大学备考的文献梳理发现, 文化资本更低的家庭, 因为父母的不利处境, 子女和父母之间更容易在情感和道德上有共情和同感。国内研究也发现, 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更具备如坚韧、懂事等(程猛和康永久, 2018)特质, 因而学业惩罚对他们而言会更为有效。后一观点有待下文进一步解释。

表5 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异质性

	情境化能力		关键认知能力		学业行为和努力		大学准备度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学习奖励	0.029 (0.039)	0.049* (0.021)	0.037** (0.011)	0.037** (0.007)	0.014 (0.026)	0.032* (0.011)	0.074 (0.071)	0.120** (0.030)
学业惩罚	0.078*** (0.009)	0.002 (0.009)	0.065** (0.020)	0.020* (0.008)	0.060* (0.020)	0.021***†† (0.001)	0.191** (0.046)	0.036*** (0.014)
学业鼓励	0.039* (0.014)	0.054** (0.016)	0.033 (0.028)	0.059 (0.025)	0.064 (0.033)	0.079** (0.020)	0.113* (0.037)	0.167***† (0.044)
作业提醒	0.063 (0.046)	0.003 (0.013)	0.025 (0.027)	0.009 (0.004)	0.061* (0.019)	0.013 (0.013)	0.113 (0.071)	0.009 (0.005)
作业知晓	0.085 (0.067)	0.036* (0.012)	0.096** (0.023)	0.036*†† (0.014)	0.048* (0.020)	0.047* (0.018)	0.246 (0.108)	0.102** (0.028)
作业帮助	0.063 (0.041)	0.095*** (0.007)	0.096** (0.024)	0.090** (0.017)	0.040 (0.028)	0.045** (0.013)	0.148 (0.094)	0.200*** (0.027)
共同讨论	0.020 (0.010)	0.014 (0.012)	0.028 (0.024)	0.046** (0.013)	0.018 (0.023)	0.021 (0.014)	0.042 (0.020)	0.054* (0.019)
常数项	46.247** (13.350)	45.787*** (4.429)	47.884** (11.256)	44.095*** (4.205)	51.327** (10.590)	45.836*** (4.542)	155.527** (34.049)	144.415*** (14.300)
样本量	752	3074	752	3074	752	3074	752	3074
R ²	0.160	0.109	0.229	0.196	0.217	0.176	0.231	0.19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学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表示 Suest 检验在 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四) 父母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机制的分析

在确证父母学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大学准备度后, 我们仍需探索父母的学业参与是通过何种路径对大学准备度起作用。再者, 由于父母在本

质上仍属于来自外在的重要他人，如何将这种外在压力转化为自身学习的内在动力，才是激发学生保持积极学习和大学准备的重要因素。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框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认为自身的教育期望往往会激发个体的学业行为和准备度，而且这种植根于个体内心深处的动机，对其行为的激发作用是更为持续和长期的。因此，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探索父母学业参与对学生大学准备度的影响是否会通过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形成中介作用机制。更进一步来说，哪些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的影响是可以内化和长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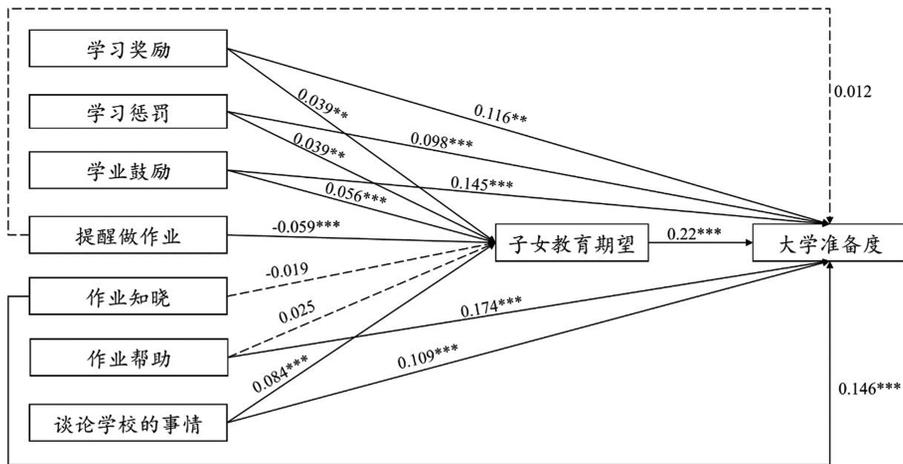


图1 父母参与、自我教育期望与大学准备度的关系机制

注：(1)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现相应影响路径效应的显著和不显著；线条旁的数值为标准化系数；(2)*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3)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 $\chi^2 = 76.883$ ， $P = 0.000$ ， $RMSEA = 0.032$ ， $CFI = 0.978$ 。(4)大学准备度为潜变量。(5)控制变量：城乡、复读、性别、民族、独生子女、初代大学生、独立书桌、班级学业表现。

如图1所示，个体教育期望确实能显著提升大学准备度。这证明了自我决定理论的合理性。学生拥有更高的教育期望之后，会激发个体进行更多的大学准备行为，如学业努力程度和信息收集等等。除了知晓子女作业情况和帮助子女的作业两个维度，其余的父母学业参与的子维度均都能通过提升子女的期望，进而提升其大学准备度。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父母参与中提醒子女作业、学业奖惩、学业鼓励、与子女共同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等维度对子代大学准备的影响更为持续和长久。再者，结合异质性分析中的结果来看，虽然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能从知晓子女作业情况中获益，但是这种父母参与对于激发子女将父母参与内化为自身动机又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优势

家庭而言,父母的作业帮助更能提升子女大学准备度,但是这种影响对其子女的动机内化也是不利的。

最后,较为有趣的结果是,父母提醒子女做作业的影响虽然是长久性的,但它反而会降低子代的教育期望。而且作业提醒对于大学准备度的影响也并不显著。因此,与作业相关的学业参与都值得警惕。这一结果与中国学者对父母参与研究的少部分研究是一致的,家长参与中部分行为的确会带来消极影响。结合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这其中的解释是,对于成绩差的学生,父母的学业提醒更为明显,因此,这种消极的学业提醒更有可能影响子代的教育期望,也即常说的父母过于频繁的参与反而引发负面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父母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和学业行为的影响已被教师、行政人员和决策者所重视,他们已经视父母参与为教育改革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中国教育决策部门正在推动家庭教育立法,以及高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与改革的背景下,尤其是面对高考这种举国关注且牵动每一位考生家长神经的重大社会事件,如何引导父母更好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如何更好帮助学生实现从高中一大学的转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

本研究利用华东地区四所县中高三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1)在学生高三阶段的父母学业参与并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只是在以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独立书桌等维度衡量的文化资本维度上,家庭背景越好的父母越倾向于参与子女的学业,而且更倾向高质量的学业参与,如作业帮助和与子女共同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这也更说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的教育表现越来越强调文化资本的重要性。(2)父母学业参与均能有效预测子女的大学准备度,但从综合指标来看,高文化家庭的父母参与更有益于子女的大学准备度提升。(3)相比于其他维度,学业鼓励和与子女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等维度均能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期望提升子女的大学准备度,因而证实这些维度对大学准备度提升的影响是最稳健的。(4)与家庭作业相关的父母参与活动,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可能会有隐性的负面效果。知晓子女的作业情况、对子女的作业有所帮助,都不能通过提高子女的期望进而提升大学准备度,而父母提醒子女做作业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甚至存在负向关系。

(二)讨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为何与作业相关的父母参与却负向预测子女的大学期望呢?研究者认为

该结论却恰恰证实了自我决定理论中“外在过多干预会破坏个体内部动机(自治感)”的判断。对于本研究而言,其内在解释是父母的过度参与引起了学生逆反心理,抑制了自我决定理论提出的个体三种需要之一的自治感需要,限制了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认知以及非认知能力,降低自身的教育期望水平。无独有偶,除了文献综述部分涉及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高燕,2016;郭筱琳等,2017;Areepattamannil,2010),Wilder也发现如果将父母参与与界定为“作业帮助”时,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业成就影响是最弱的(Wilder,2014),而如果将父母参与操作为“父母期望”,父母影响则是最强的。Min等人(2010)基于美国“儿童早期追踪调查”的数据也发现,父母的作业帮助对子女自主学习能力有负向影响,而其中的机制是父母的参与限制子女的自主选择能力。虽然本研究关注的不是学业表现,但影响的方向和重要性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作业提醒”“作业知晓”“作业帮助”等三个维度的“作业帮”,很可能导致“帮倒忙”的结果。

在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部分,研究者认为,除了学校要主动承担起补偿弱势家庭大学准备不足的责任(如增设升学规划和学业咨询师资)之外,对父母参与而言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首先,激发子女的学业努力程度,对弱势家庭来说,可利用学业惩罚机制;对于优势家庭可以利用学习奖励机制。其次,多使用共同参与的策略。对子女进行学业鼓励和与学生共同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最后,在子女作业方面,对提醒子女做作业、知晓子女的作业情况和帮助子女作业要有一定的理性认识。父母应该注意沟通的策略,做好与子女的深度交流,关注学业知识以外的非认知能力,如自控力、自信心、适应力、内在学习动机。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关注点在于县中,而其他类型高中是否有相同特点,则很难进行推论。未来研究可对市区高中进行调查,探索是否存在高中类别差异。再者,虽然自我决定理论为因果关系的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未来还需采用更严谨的技术或追踪调查作进一步的因果关系检验。最后,本文提出的大学准备度的理论构建还是一个初步探索,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该视角对于当前关注高中—大学衔接、治理县中衰落的理论和政策探索依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 安桂清、杨洋,2018:《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参与对子女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第20期。
- 鲍威、金红昊、肖阳,2019:《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

- 持》，《中国高教研究》第5期。
- 鲍威、李珊，2016：《高中学习经历对大学生学术融入的影响——聚焦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6期。
- 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孩子“非认知能力”培养应成为家庭教育重心》，《光明日报》，7月12日。
- 程猛、康永久，2018：《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邓晖，2018：《大学生写作短板亟须补齐》，《光明日报》，5月21日。
- 高燕，2016：《父母教育卷入对中小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教育测量与评价》第12期。
- 郭筱琳、周寰、窦刚、刘春晖、罗良，2017：《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教育期望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共同调节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华桦，2019：《新高考下家长参与“大学准备”的影响因素：家庭背景与学校支持》，《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
- 黄兆信、李远照，2010：《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研究——从高中与大学衔接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第5期。
- 李波，2018：《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的视角》，《教育与经济》第3期。
- 李佳丽、薛海平，2019：《父母参与、课外补习和中学生学业成绩》，《教育发展研究》第2期。
- 李晓晗、郑磊，201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EPS数据的研究》，《教育经济评论》第1期。
- 梁文艳、叶晓梅、李涛，2018：《父母参与如何影响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基于CEPS基线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学报》第14期。
- 刘爱玉、徐春蕾，2019：《初中生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获得——基于控制要素的调查问卷》，《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 罗良、吴艺方、韦唯，2014：《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马莉萍、朱红，2014：《如何顺利实现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高中生高考后暑假生活的实证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第11期。
- 王菊韵，1994：《从中学到大学数学学习思维的转换》，《黑龙江高教研究》第5期。
- 王晓东、范武邱，2017：《大学准备度提升：美国大学的应对策略》，《现代大学教育》第2期。
- 王毅杰、黄是知，2019：《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和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社会科学》第7期。
- 魏建国、罗朴尚、宋映泉，2011：《高中学生对大学成本和学生资助信息的知晓状况分

- 析——基于对我国西部 41 个贫困县的调研》，《教育发展研究》第 21 期。
-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第 5 期。
- 吴帆、张林虢，2018：《父母参与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 12 期。
- 吴重涵、张俊、王梅雾，2017：《是什么阻碍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阶层差异、学校选择性抑制与家长参与》，《教育研究》第 1 期。
- 杨三喜，2019：《不能任由“县中衰落”继续下去》，《光明日报》，11 月 15 日。
- 赵琳、王文、李一飞、纪洪超、史静寰，2014：《大学前教育经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议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 3 期。
- 仲玉维、杨国营，2013：《高考作文套路化严重，阅卷老师怒批“假大空”》，《现代教育报》，1 月 16 日。
- 钟宇平、陆根书，2005：《高中生高等教育需求的经济动因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第 6 期。
- 周晨、周凌轲，2019：《中学与大学语文教育的隔阂——以学术写作为例研究》，《中国校外教育》第 15 期。
- 周文叶，2015：《家长参与：概念框架与测量指标》，《外国教育研究》第 12 期。
- Aarepattamannil, S. 2010, “Parenting 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 and Children’s School Achievement”, *Psychological Studies*, 55(4): 283–289.
- Baber, L. D., E. L. Castro, D. D. Bragg, 2010, “Measuring Success: David Conley’s College Readiness Framework and the Illinois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Act. In Brief”.
- Conley, D. T. 2007. *Redefining college readiness*. Retrieved from Eugene.
- Conley, D. T. 2008, “Rethinking college readiness”,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44: 3–13.
- Conley, D. T. and E. M. French, 2014, “Student Ownership of Learning as a Key Component of College Readines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8(8): 1018–1034.
-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 *Corporate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Achieving Our National Education Priorities. The Seven Priorities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 George, M., A. Cabrera, E. R. Kurban, 2018, “Connecting School and Home: Examining Parental and School Involvement in Readiness for College Through Multilevel SEM”,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60: 553–575.
- Häfner, I., B. Flunger, A. L. Dicke, H. Gaspard, B. M. Brisson, B. Nagengast, U. Trautwein, 2018, “The Role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for Students’ Academic Outcomes: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Child development*, 89(4): 1405–1422.
- Holcomb-McCoy, C. 2010, “Involving Low-Income Parents and Parents of Color in College Readiness Activi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4(1).
- Lauren, E. 2013.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the College Student Transition: A*

- Qualitative Study at a Large Midwestern University*. (Maste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eonard, J. 2013, "Maximizing College Readiness for All through Parental Support", *School Community Journal*, 23(1): 183—202.
- Li, A. and D. Hamlin, 2019, "Is Daily Parental Help with Homework Helpful? Reanalyzing National Data Using a Propensity Score-Based Approach",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2(4): 367—385.
- Min, X., S. Benson, R. Mudrey-Camino, R. P. Steiner, 20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of Fifth Graders: A Path Analysis using the ECLS-K Database",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3(2): 237—269.
- Mokher, C. G. and D. M. Leeds, 2019, "Can a College Readiness Intervention Impact Longer-Term College Success? Evidence from Florida's Statewide Initiative",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90(4): 585—619.
- Pearson, S. T. 2018. *Active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A Qualitative Study*. (Doctoral), Rowan University.
- Perna, L. W. and A. M. Titus,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Enrollment: An Examination of Racial/Ethnic Group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6(5): 485—518.
- Ryan, R. M. and E. L. Deci,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68—78.
- Sheridan, S. M., L. L. Knoche, C. P. Edwards, J. A. Bovaird, K. A. Kupzyk, 2010, "Parent Engagement and School Readiness: Effects of the Getting Ready Intervention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ies",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1(1): 125—156.
- Spera, C. 2005,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 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7(2): 125—146.
- Stephany, C. 2017. *Understanding Latina/o Undocumented Parents' Engagement in Students' College Readiness: A Literature Review*. (Doctoral), Harvard University.
- Thomas, V., F. D. Backer, J. Peeters, K. Lombaerts, 2019,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 the Mediation Rol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22(2): 345—363.
- Wilder, S. 2014,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synthesis", *Educational Review*, 66(3): 377—397.

The Effect of Parent Engagement on Their Children's College Readiness
——A Field Surve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Four Counties in East China

WANG We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ege readiness is a powerful indicator to predict students' successful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university,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n China. Based on the parental involvement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from a surve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four counties in east China,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ngagement on their children's college readiness and its mechanism. We found that the degree and quality of parent engagement were only related to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measured by an independent desk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confirmed that parental involvement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children's college readiness, bu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Academic rewards are more useful for families with high cultural capital, and academic penalties are more useful for families with low cultural capital. Parents' academic encouragement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about what is going on at school have a more robust effect on college readiness. Furthermor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test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ound that homework related parents' academic participation could not improve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us their college readiness.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daily academic participation of parents requires renewed vigilance, focusing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and skill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dren'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For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chools should make up for their disadvantages in college preparation.

Key words: parents' engagement; college readines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county high school

(责任编辑: 杨娟 责任校对: 杨娟 胡咏梅)